

中国 传统 人生哲学

主编 詹万生

中国工人出版社



0821
45



200020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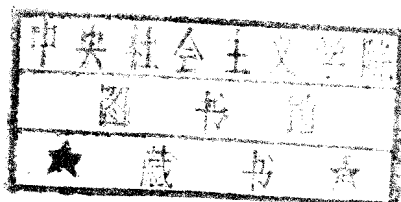
98231

DFS

00

人	中
生	国
哲	传
学	统

主编 詹万生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詹万生主编.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10
ISBN 7-5008-1837-8

I. 中… II. 詹… III. 人生观-中国-古代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923 号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

詹万生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刷:	航天科技情报所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	1250 千字
印张:	53.125
印数:	1~2560 册
定价:	88 元

序

张岱年

人类生活充满了许多矛盾,因而引起许多问题。庄子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庄子·至乐》)由于有许多问题,所以引起许多忧虑。孔子以为“仁者不忧”,但未达到仁者的一般人还是有忧的;而仁者亦有所忧。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庄子更以为仁者多忧:“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彼仁人何其多忧也!”(《庄子·骈拇》)荀子对人类生活中的问题有比较具体的说明,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富国》)人必须过群居的生活,而在人群中难免发生斗争。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必须设法加以解决。孔子以为应遵循一定的“道”,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他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儒家宣扬不可离的人生之道。道家则以为人生之道应以广大自然的普遍的“道”作为依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墨子以为儒家的道只是“周道”,而“周道”有所偏失,应回到治水的大禹之道。法家则以为道应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没有古今不变的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自宣扬自己的人生之道,相互争论。儒道之间有“有为”与“无为”之争;儒墨之间有“爱有差等”与“爱无差等”及义利异同之争;儒法之间有德教与法治之争。通过这些论争,关于人生问题的理论思维达到了高度的发展。诸家虽然观点不同,各有所偏,亦各有所见。

战国时代,诸子争鸣。两汉之际,佛教传入,其后流传渐广。于是又出现儒佛之争、道释之争。迨至宋代,理学家在批判道家佛学的同时,又吸取佛道的一些思想观念,重新表扬孔孟之教,把理论思维推进到新的水平。明清之际,涌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具有一定启蒙思想的卓越学者,对于人生的理论又有新的阐发。

自周秦以来,历代哲人,关于人生讨论了许多深刻的理论问题,如人性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生价值问题,群己关系、有为无为、义利、理欲等问题,力命问题以及死生问题等,各家立论不同,但都表现了一定的人生智慧。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仍是值得深入考虑的问题。今天,在面对现实生活的同时,参照古代哲人对于这些问题的辩论,仍能受到深刻的启发。

詹万生同志和致力于人生哲学研究的同仁为了阐发和弘扬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精华,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帮助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裨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为了使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华文化,决定编写《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詹万生同志的计划见示,我认为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工作,对于澄清关于人生理想的思想问题,必将大有裨益,于是略述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思想的源流,作为序言。

1992年1月序于北京大学

前言

詹万生

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人生哲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对人生的思考和论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广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人生哲学的精华,对于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曾经指出:“我国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具有重要的帮助的。”¹同时他又指出,对待历史遗产,要给以批判的总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弘扬民族文化的根本目的,是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人生哲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仍然是我们对待中国人生哲学的准则。

中国现代哲学家对中国人生哲学论述最多且最深刻的,应当首推冯友兰和张岱年两位先生。关于人生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问题,冯友兰指出:“人生哲学即哲学中之人生论,犹所谓自然哲学,乃哲学中之宇宙论也。伦理学乃人生哲学之一部,犹物理学乃所谓自然哲学之一部也。哲学以其知识论之墙垣,宇宙论之树木,生其人生论之果实;讲人生哲学者即直取其果实。哲学以其伦理学之筋骨,自然哲学之血肉,养其人生论之灵魂;讲人生哲学即直取其灵魂。质言之,

¹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9页。

哲学以其对于一切之极深的研究,繁重的辩论,以得其所认为之理想人生;讲人生哲学者即略去一切而直讲其理想人生。由斯而言,则人生哲学又可谓哲学之简易科也。”^① 张岱年先生也曾在他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把中国哲人所讨论的哲学问题,概括为宇宙论、人生论、考知论三部分,并且认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他还指出:“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接触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② 两位先生的见解是极其深刻的。

中国哲学一向以道德哲学或人生哲学著称于世。它不但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而且确实具有完备的体系和博大精深的理论。笔者认为人生哲学的体系由人性论、人生论和范畴论三部分构成。“人性论”,是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石,历代哲人在讨论人生问题时,无不对人性问题发表见解并展开争论。春秋战国时期是人性问题争论的发端期,争论的焦点是人性善恶问题。先秦两汉时期围绕这一争论的焦点,提出了六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孟子的“性善论”,二是荀子的“性恶论”,三是告子的“性无善恶论”,四是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五是扬雄的“善恶混杂论”,六是董仲舒的“性三品论”。这些观点后来在魏晋隋唐和宋元明清时期又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丰富和发展,其中“性善论”居于统治地位,为儒家的人生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生论”,是人生哲学的主体,中国人生哲学的主要流派——儒、道、佛三家对人生的认识都形成了各自一套完整的体系。在人生真谛、人生理想、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等主要方面都形成了各自的观点,其中儒家的人生论更为系统,更加完善。“范畴论”,是把握中国人生哲学的关结点,也是人生论在各个方面的具体展开。中国人生哲学的主要范畴有:天与人、人与我、公与私、义与利、荣与辱、苦与乐、志与功、力与命、才与性、理与欲、生与死,等等。这些范畴说明了中国哲人对人生的认识全面而深刻。总之,人生哲学远比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内容更丰富,论述更深刻。因此,人生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

人生哲学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后世人生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人生哲学》第一卷,第35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1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重印版。

在“四书”“五经”等古代典籍中,具有积极意义和真理性的东西,被当作格言、成语流传下来的有千百条,其中最能鼓舞人、激发人而为后世所传诵的,仅《论语》一书中就有近百条。例如:属于意志情操的有“杀身成仁”、“见义勇为”、“任重道远”、“匹夫不可夺志”、“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等;属于思想品德修养的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择善而从”、“成人之美”、“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等;属于求知好学的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耻下问”、“发奋忘食”、“三人行必有我师”等。此外在待人处世、正己修身、交友之道等方面也有许多至理名言,这方面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在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中,人生哲学作为指导人生实践的格言经过千百年来积淀,有些光辉的思想已构成了我们的民族之魂。例如:我们民族历来强调那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为他人献身、为民族献身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人后己精神;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以天下利益为己任的整体主义精神;那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正义而献身的高风亮节;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憎分明的精神;那种勤劳俭朴、自力更生、诚实守信的求实精神,等等。这些人生格言都曾经哺育了中华民族亿万优秀儿女的健康成长,都曾经激励过无数志士仁人、英雄豪杰为民族的兴旺发达,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写下了人生的壮丽篇章。

中国人生哲学中的积极因素,也曾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批判吸收,用于党内教育和指导党的事业的著作中。刘少奇同志在讲到共产党员应该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最大多数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时候,就曾经引用中国人生格言来教育共产党员。他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①《毛泽东选集》中引用孔子的话就有十多处,毛泽东在强调全党同志都应努力学习的时候,就引用孔子的话说:“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采取这种态度。”^②可见,中国人生哲学已经作为一种民族精神,深深

①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41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3页。

地积淀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和意识里,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观。

中国人生哲学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已经远远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众所周知,在日本、朝鲜、新加坡等国家,孔子的思想得到极大重视和应用。他们现代经济的振兴,被看作是西方的科学技术与中国的儒学思想结合的产物。近年来,“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的现代化”已成为当前海内外中国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新加坡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在政府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全社会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的现代化国家。1979年,前总理李光耀亲自主持了“讲华语”运动,这是正式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的前奏。1982年教育部宣布从1984年起,中三、中四学生必须选修一门“儒家伦理”课程,同年成立了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有计划招聘世界各国儒学研究专家赴新做研究工作,并成立了“国际儒学研究中心”。1987年9月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曲阜联合召开了儒学国际会议。目前,儒学伦理与新加坡精神已融为一体。在日本,儒学的影响更是由来已久,儒学与神道相结合,凝聚为日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日本企业界非常重视儒学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他们认为“日本式管理”的观念导源于儒学。日本学者高桥教授预言:从世界的观点来看,在欧美产生和发展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已面临走投无路的境地。而中国传统的人生观和社会伦理观,将会领导21世纪的世界文化。另一位日本学者井上靖先生在他的专著《孔子》一书中说:“孔子是乱世造就的古代(公元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以研究《论语》著称的美国克里尔教授与我国和辻哲郎博士把孔子称为‘人类的导师’,这是最恰当不过的评价。孔子的确是永恒的人类导师。”^①

在欧美,孔子的思想同样受到专家学者的尊崇。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都十分赞美孔子的人生哲学,伏尔泰认为基督不过是禁人行恶,而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劝人行善。他尤其推崇孔子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思想,说:“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

① [日]井上靖:《孔子》,第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① 孔子的崇高形象,在法国一直保持至今。在纪念孔子诞辰 2500 周年的时候,法国专门出版了关于孔子的著作《圣人的四书》,以此来纪念法国人民心目中的伟大思想家。在英国,1974 年出版的《新大英百科全书》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与中国学术是同义语,……如果有人要问,中国人民的传统的生活与文化可以用什么字来表示,其答案只能是‘孔子’。”在美洲,近来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列举了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被列为首位。美国著名哲学家宾格勒编写了《孔子以风俗为神圣》一书,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他反复读了《论语》之后,“深感孔子所代表的哲学思想,可以与世界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相比,并且毫无逊色。”由此可见,中国人生哲学在人类的思想宝库里占有重要地位,它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二

在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儒家人生哲学的问题上,“五四”以来就有着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批判继承,这是唯一正确的主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人生哲学必须坚持这一正确的主张,反对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是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食古不化;另一种是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鼓吹“全盘西化”。

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不是要搞复古主义。中国的人生哲学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人生哲学也具有两重性,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和封建等级制度之上的人生哲学,必然有狭隘性和保守性的一面,诸如鄙视劳动、宗法观念、家长作风、忠君思想、因循守旧、封建迷信、男尊女卑,等等。这些消极的东西在人生理想论、人生态度论、人生修养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它们曾经是导致我国社会长期停滞的思想根源之一。因此,对待中国人生哲学绝不应不分良莠,兼收并蓄,而应当批判地继承,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① 见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 292 页。

对于中国人生哲学,如果我们摒弃其封建主义的阶级内容,剥去其唯心主义的外衣,就可以发现它的合理内核,看到它的进步性和积极意义。

首先,中国人生哲学体现的是一种整体主义思想,它对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和民族团结是有进步意义的。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哲学家大都把建立和谐统一的社会作为自己的责任,儒家人生哲学的宗旨是“兼善天下”,是“济世利他”。“仁者爱人”的人生理想与“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礼记》以孔子的名义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仁者爱人”的人生理想所要求的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与“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所描绘的蓝图是一致的,二者互为条件,互为目的。“中庸之道”的人生态度,目的也是为了建立和谐统一的社会。“正己修身”的人生修养,目的还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整体,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或为家族或为国家或为天下的一员,群体受到损坏,个人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保障。因此,儒家总是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国家统一、社会太平。自秦汉以来,中国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暂时的分裂局面,但很快又获得了统一,这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历史上还多次出现过少数民族执政的情况,然而,每一次少数民族执政都是一次民族融合,这与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可见,儒家人生哲学所体现的整体主义思想对于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也说明,汉以后历代统治阶级都尊孔崇儒,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中国人生哲学蕴含着一定的辩证法思想,它对于调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有进步意义的。

儒家的人生理想是追求“仁爱”,崇尚道德,但并不否定刑罚;主张“德政”,但不否定法治。然而,二者相比,儒家认为道德具有更根本、更重要的意义。这里边蕴含着辩证法的因素。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

统治者如果只用政治手段,施加刑罚,最多只能使老百姓不敢犯罪,但不能使他们感到羞耻。如果能用道德来教育和感化他们,用礼仪来规范和约束他们,老百姓不敢也不会犯罪,还会感到犯罪是可耻的事。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也指出,法令“可以诛恶,非所以劝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历代统治者都运用“德威并重”、“宽猛相济”的统治术来治理国家,这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从历史上看,什么时候仁爱思想比较畅明,什么时候社会风气就相对好转;什么时候实行“仁政”,什么时候社会就比较稳定。这说明仁爱思想与“仁政说”对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庸之道的人生态度更具有辩证法的因素。中庸辩证法主张“执两端而用其中”,在矛盾对立中“致中和”。中和与统一不一样,统一是矛盾对立的双方经过斗争存下一方,达到统一;而中和是矛盾对立的双方经过调节可以同时存在,达到和平共处。可见,中庸之道对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调节功能。

儒家的人生哲学,还特别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在人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正己修身的人生修养也具有辩证法的合理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它的修养方法上。儒家提出的修养方法是“推己及人”、“能近取譬”、“舍身处地”和“将心比心”。儒家人生哲学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精微、广博的发展,与这一方法论原则有重要关系。所谓“能近取譬”,就是能以自己作比,推及别人的意思。“推己及人”的方法,就是从自己的亲身需要、愿望和追求出发,推想到别人的需要、愿望和追求,从而体察和理解他人,自觉调节人我关系。这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修养方法对调节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中国人生哲学强调的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它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和理想人格塑造,是有进步意义的。

儒家人生哲学的价值取向,就是重视精神境界,认为人的精神需要高于物质需要。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于人生理想、人生态度和人生修养之中。孔子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人在社会中必须依赖水火等物质条件而生活,但是水火有时还会给人们带来危害。然而,作为精神境界的

“仁”，却只能给人们带来利益，而不会有任何伤害。孔子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上）孟子也说过：“生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当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就只有牺牲自己的物质需要，去追求崇高的精神需要。

儒家这种重视精神境界的思想，在“义利观”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儒家认为义重于利，强调要“见利思义”，“义以为质”、“义然后取”、“先义后利”，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儒家还十分推崇重视精神境界的理想人格，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历代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层出不穷，我国素有“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的美称，这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有直接关系的。可见，儒家这种重视精神境界，对于塑造“志士仁人”、“大丈夫”这样的理想人格，对于陶冶民族性格和建设精神文明，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

当前，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而且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是历史长河的一定阶段。现代文明无一不是在已有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应该看到，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中国人生哲学这份遗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的许多方面并不是为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时代所独有的，也不只是为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时代所利用的。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人生哲学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又要重视它的继承性和借鉴性。中国人生哲学在人生理想、人生态度和人生修养等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他们提出的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闪烁着哲理的光辉，其中有些东西一旦赋予新意，便可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便可以成为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思想材料。对于中国人生哲学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革命变革和改造利用，使之赋予新的内容和新的含义，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

三

每一个时代,人们都有适应该时代特点的生活,而生活又呼唤着代表该时代精神的人生哲学。然而,新时代的生活内容不管有多么新,它仍然未能超越中国人生哲学范畴所涵盖的方方面面。中国人生哲学对当代青年学生的人生观教育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整个80年代,我一直在大学里从事人生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主编了《人生哲学》教材和一部《人生哲理教学参考》,撰写了几十篇人生哲学和人生观教育的论文,写过几本人生观教育的小册子,还与同仁合作编写了一部《世界人生名言大辞典》。因此,在这方面感受颇深。我们不妨回顾一下80年代对大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的历史。

80年代对大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大体经历了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针对“人性自私论”进行人的本质教育。1980年4月,某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文章,文中提出了两个命题,一是“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二是“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于是引起80年代第一场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有人提出了若干似是而非的观点:“人的本性就是动物性”,“弱肉强食、生存竞争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自私不是坏东西,它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雷锋助人为乐,是为了满足他的精神需要,也是自私的”等等。这场讨论对大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成为大学生的一个时髦的话题。1982年硕士研究生考试中有这样一道题:“试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人都是自私的”。在一千一百份答卷中,有30%的考生回答不及格,甚至有的学生竟把它当作一个正确命题而论证。为了从理论上批判和澄清“人性自私论”,相当一部分高等学校开设了人生观教育课,并且把“人的本质”作为一章写入教材,用中国人生哲学中的人性善恶之争启发学生,并引用古人的话“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来说明人的需要不等于自私的道理。然后进一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第二阶段,针对“渺茫论”进行人生理想教育。1982年,社会上刮起了一股“理想渺茫论”的歪风。一些人热衷于宣传“理想是天上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及”,有人曲解恩格斯的话:“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以此来论证“讲实惠”、“一切向钱看”的“合理性”。这股思潮对大学生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1982年下半年,一所高校对八〇级八百名学生进行人生观问题调查,其中“你如何看待理想”一题,有32%的学生这样回答:“理想=幻想+美梦”,“理想是烦恼的根源”,“理想是空洞的说教”,“理想是天上的星星,现实是眼前的灯,我爱星星,但离不开灯”。在这种情况下,高校的人生观教育突出了理想教育的内容。在理想教育中引用了中国人生哲学中理想论的丰富内容,如《吕氏春秋》中提出的:“凡举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道理,启发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正确处理最高理想与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的关系,收到了一定的教育效果。

第三阶段,针对“人道主义”和“异化论”进行人生价值的教育。1984年前后,理论界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展开论战。这种思潮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比如有的大学生就给报刊写信,对当时学习张华的活动提出质疑:“张华救老农值得吗?”他的观点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舍身救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农,等于拿金子换等量的石子,是毫不值得的。另有一位青年投书杂志,他认为人应该心安理得地做一个“既要贡献,又要索取;既不占便宜,也不吃亏”的人。针对这种思想情况,高校的人生观教育又增加了“人生价值”一章。在这一章中,阐述了中国人生哲学中关于重视精神价值,崇尚理想人格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见义勇为和正确对待贡献与索取的关系,坚持了正确的价值导向。

第四阶段,针对“拜金主义”进行“义利观”教育。1985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知识贬值”,脑体收入“倒挂”,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有些人便直言不讳地提出了“金钱至上”、“拜金主义”、“唯利是图”、“重利轻义”的思想观点,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一时间,大学生中出现了“厌学风”、“经商热”和“公司热”。相当一部分学生感到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和学习的动力,成才意识淡化和新的读书无用论在高等学校里蔓延。

在对“义与利”、“成才与发财”的认识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和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高校的人生观教育又增加了“义利观”的内容。中国人生哲学中的义利之辨内容十分丰富,在义利观教育中大有用武之地。其中“义以为质”、“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勿见小利”、“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等观点,在义利观教育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第五阶段,针对“西方哲学热”和“文化比较热”增加了中国人生哲学的教育内容。1986年以来,社会上翻译出版和介绍西方哲学及中西文化比较的书籍大量涌现,萨特、尼采、弗洛伊德的思想到处流传,几乎成为大学生课外的“必读物”。大学校园里出现了“西方哲学热”和“文化比较热”。1987年,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刘勇杀人后自杀的事件就是一个受西方哲学影响的典型。他推崇萨特存在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欣赏尼采“超人哲学”中“我即太阳”的思想,形成了一套“自我万岁”的人生哲学,最终从醉心自我,走向自我毁灭。针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倾向,高校的人生哲理教材中设专章系统介绍中国人生哲学,对学生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对西方哲学思潮的泛滥起到遏制作用。

第六阶段,针对“参政热”和“民主热”进行人生责任和人生道路的教育。1988年,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些暂时困难,有些人便借此大作文章,鼓吹经济上的“私有化”、理论上的“多元化”、政治上的“多党制”、文化上的“全盘西化”。这些自由化观点直接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对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以至对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疑虑。某杂志上发表了大学生郎郎的诉说《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在大学生中掀起了对人生的思考和辩论。如果说80年代初期大学生对人生问题的探索偏重于理论思考的话,那么这次对人生的求索则更多地偏向于人生实践和社会实践问题,并且从关注自我转向关注社会,“参政热”和“民主热”在大学校园里不断增温。针对这种情况,高校的人生观教育增加了“人生责任”和“人生道路”的内容。有些教师坚持用中国人生哲学引导学生,用“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幅武侯祠的对联告诫学生要审时度势,在一定范围内、部

分学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上述可见,80年代大学生所面临的人生问题和思想困惑,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在中国人生哲学中找到解答问题的思路。其中有些闪烁着哲理光辉的名言警句,仍然可以指导今天的人生实践。

四

基于上述认识和体会,早在1989年我就萌生了编写一部《中国人生哲学》的念头。1991年6月,我编写出了《中国人生哲学系列丛书》计划,并初拟了20本书的目录。这就是:《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信仰论》、《人生目的论》、《人生态度论》、《人生价值论》、《人生修养论》、《天人关系论》、《人我关系论》、《义利之争》、《理欲之辨》、《才性之辨》、《中庸之道》、《志功论》、《力命论》、《知行论》、《情爱论》、《荣辱论》、《幸福论》、《生死论》。当我把这个计划拿出来征求意见时,得到了同行朋友们的赞同和支持。编写班子的成员都是来自于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沈阳等大学里从事人生哲学或伦理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由于编写成员的变化等诸多原因,使该书在编写体例和出版形式上有了新的变化,终于以现在的面貌展示于读者面前。

该书共包括九个部分,分别为:第一篇《人性论》,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詹万生执笔;第二篇《天人论》,由安徽师范大学的戴家龙执笔;第三篇《义利论》,由湖南师范大学的王泽应执笔;第四篇《理欲论》,由广州高等金融专科学校的宋启林、傅柏松执笔;第五篇《中庸论》,由兰州商学院的朱岚、甘肃省委宣传部的王维平执笔;第六篇《情爱论》,由辽宁大学的崔莉执笔;第七篇《价值论》,由上海师范大学的周中之、鲍炳中、黄伟力、殷啸虎执笔;第八篇《原道论》,由中国人民大学的龚群执笔;第九篇《生死论》,由首都医科大学的王晓燕、杨淑玲、董平执笔。

编写这样一部书是我的夙愿,同时对它报有很高期望。早在制订编写计划时就明确地提出了编写要求:1. 科学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人生哲学遗产进行批判继承,弘扬其民主性精华,摒弃其封建性糟粕,古为今用,发展创新。2. 理论性,要求以史带论,史